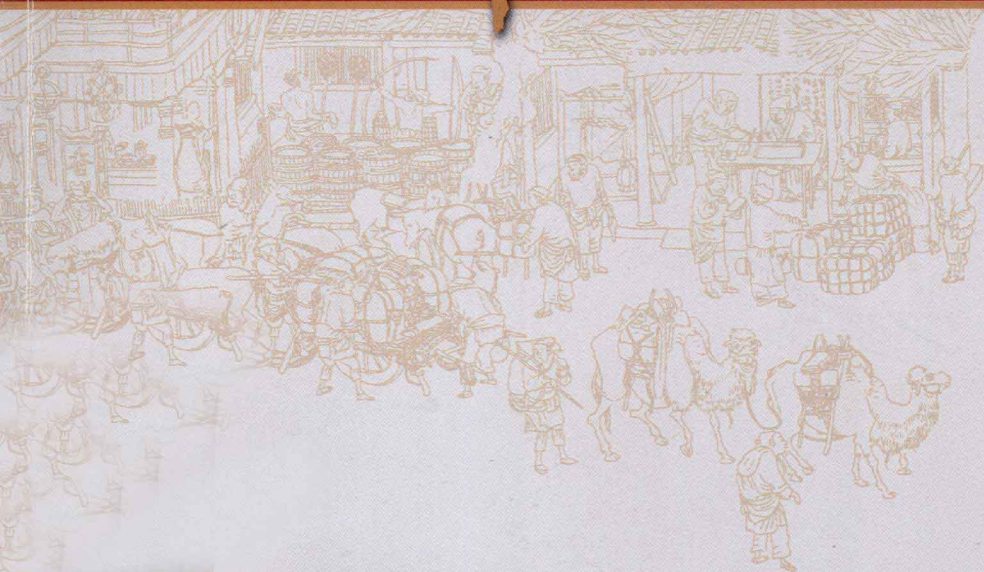


看透十大商帮的前世今生
解读中国商人的文化基因
揭示官商相处的隐秘规则
重塑天下华商的精神品格

当商帮已成浮云

徐志频 著



徐志频 著



当商帮已成浮云

看透十大商帮的前世今生
解读中国商人的文化基因
揭示官商相处的隐秘规则
重塑天下华商的精神品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商帮已成浮云/徐志频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334-5618-4

I. ①当… II. ①徐… III. ①商业史—研究—中国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157 号

当商帮已成浮云

徐志频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 500 米 邮编: 102600)

开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数 203 千

插页 1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334-5618-4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7445) 联系调换。

前言

公民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商人

文/伍继延

公元2009年岁末，当我主导的湘商文化建设星火燎原，湘商也从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所谓新十大商帮之际，《中国商人》杂志就当时“商帮热”进行专访，并以“伍继延：十大商帮都该死去”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公开报道，一夜之间，我从商帮文化的推动者转变为批判者，让关心我的朋友们眼镜大跌！

这次徐志频先生的新作《当商帮已成浮云》出版之际，应其邀作前言，心情忽然有些忐忑：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经了多少生死轮回，凤凰涅槃？而传说中的“十大商帮”，又将经历怎样的“前世浮云，今生神马”的转变？



伍继延

著名商会活动家。

2003年，牵头注册成立最早的异地民间湖南商会——重庆市湖南商会，出任会长；2006年发起首届全国异地湖南商会协作联谊网，并担任召集人；2008年担任中国杰出湘商评选组委会主任，成功组织了“中国杰出湘商”系列评选活动；2009年5月，成功组织“2009湘商寻祖活动”。

2008年获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人物提名奖；2009年被评为“湖湘文化100位名人”；被文化界、传媒界定义为“湘商文化创始人”。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震动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坚船利炮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和一整套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与制度；其所包含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自由新闻、民主政治等制度设计，与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能否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某些内生商业文明基因相融合，使中华文明在应对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战，经历再一次礼坏乐崩之后，迎来第三次复兴？在这个海洋文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还能够成功应对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冲突，融合天下文化，实现中华文明的全球性崛起吗？

为此，我们必须从经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商帮作一次梳理。

我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并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当时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历史上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各地，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是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包括法制不健全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地域、血缘自然形成的，那时，全国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应该兴起。而当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是个大市场，中国加入WTO以后又融入一个更大的市场，这两大市场是趋向于统一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因此，传统商帮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日渐衰亡。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回溯自己文化的根，有了各种各样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潮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引起地方政府共鸣，拿来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手段，也是各地新兴商帮纷纷出现的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张，网络时代的无限沟通，也让建立在各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所谓新商帮，面临未来向何处去的严峻挑战！

二

虽然企业家现在看起来是社会上有钱有影响力的新群体，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靠自己的能力，更多是时代的剧烈转型给我们造成一种特殊的空间和机会。我经常跟很多老板讲：你以为是你牛，是你的个人能力吗？你仔细想想你在这个发财的过程中，究竟多少是靠你的智慧，靠你的知识，靠你的管理经营，还有多少是靠特殊的政策机会和所谓的“关系”？当然，财富到了能把它用好的人手里是最重要的，与其让财富在贪官污吏手里糟蹋了，在纨绔子弟手里挥霍掉，不如掌握在企业家手里，把财富更有效益地用起来。

可喜的是，在改革开放这场亘古未有的经济社会变革大潮中，作为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和受益者的一批具有当代公民意识的企业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强大的组织创新能力，开始突破所谓地域商帮的局限，并以民间商会建设为契机和枢纽，实践着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使命。

当代的民间商会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成立的。作为当代中国新型商会的开拓者，虽然我们并不能从国家法律法规和前人的实践中找到什么是“商会”的标准答案，但我们从自己多年的直接经验中确切地知道：

第一，商会不是家族或者家庭，不能搞任人唯亲或者专制独裁的“家长制”；

第二，商会不是企业，不能以赢利为目的，更不能谁出钱多谁就说了算；

第三，商会不是政府，会长的权利来自会员的拥护而不是上级的任命，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

作为全体会员共同的组织，只有唤起广大会员关注、发动广大会员参与、代表广大会员利益、表达广大会员要求、维护广大会员权利、接受广大会员监督，这个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顺势而生的新生事物，才能挣脱几千年封建主义专制独裁的精神枷锁，才能远离近年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急功近利的低级趣味，才能超越“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窝虫”的性格宿命，成

为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动者。

民营经济稚嫩、弱小，这使它迫切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弱小，它需要保护；因为稚嫩，它需要规范。所以我认为民间商会首先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

其次，民间商会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什么？我的理解就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还给社会组织。民间商会刚好可以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之一应该是民间社会组织。

此外，我认为民间商会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有一些抓手，商会章程规定它是民主的商会，其组织形式也是民主的组织形式。这就可能使广大会员在商会活动中得到很好的民主训练、学习。任何一种民主，一定需要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如我们在农村搞村民自治，在城市搞社区选举，商会也可以成为锻炼会员民主能力的舞台。

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产物，也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更将为“还权于民”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三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2011年惊蛰时节，再读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这句平常诗，唤醒自然万物的春雷依然像千万年来一样滚滚，但我的胸中却有别样的春潮在澎湃：期待已久的加快社会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发展商会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这些深刻阐述，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

里程碑意义。

只有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的活力，才能使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中央政府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姿态面对商会组织，不断释放营造更多、更大、更广的公共空间。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办好现代商会呢？

第一，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会务公开商会。商会者会员之商会，会务者会员之事务，会员不知，谁知？会员不议，谁议？应当将会务公开作为商会的立会基本原则。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即时沟通、扁平管理、多元互动、信息无限的技术优势，第一时间充分公开会务信息，全面听取会员意见，杜绝信息垄断和人为阻隔。

第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管理规范商会。工业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思想的变革，要求我们摆脱农业文明时代人治的陋习，学习法制的精髓，把商会的管理建立在国家法律和商会章程与制度的规范下；要求我们按照现代管理的基本规律，规范日常管理的职责分工和会务工作的操作规程，明确工作的考核监督，加强工作的计划控制，减少自选动作的风险，避免随心所欲之代价。

第三，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制度民主的商会。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总结毛泽东晚年失误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浩浩大潮，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权力意识不断提高，契约观念不断增强，民主要求不断扩大。民间商会作为全体会员自愿组成的群众团体，毫无疑问其一切权力来自会员，一切利益属于会员，一切会务也决定于会员。如何真正从制度上落实章程的规定，保障广大会员的各项权力，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知情权、批评权、罢免权等等，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解放思想是“起”，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全面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第二次解放思想是“承”，是面对当时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集中力量发展市场经济；而新的解放思想是“转”，提出民本，还权于民，既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必须，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为未来的“合”，即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治民主的中国奠定基础。

2009年9月26日，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前夕，第三届湘商大会在伟人故里湘潭成功召开。9月28日，我发起并组织来自各大商帮的千名华商代表齐聚韶山，向开国领袖毛泽东敬献花篮，共庆新中国六十华诞。我代表天下华商于韶山毛泽东广场发布《湘商韶山倡议书》，庄严宣示：

“为继承领袖创业精神，弘扬中华商道文化，应对世界风云变幻，共谋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倡议：

坚定创造财富的人生梦想，发展产业，造福人民！

坚守商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维护市场规范，建设和谐社会！

坚持中华先辈的传统精神，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华大地各大商帮，正在走向新的融合。

中华民族崛起的新途径是振兴经济，中华经济振兴的新标志是华商崛起，中华商帮的新使命是创造和谐天下！

天下华商的崛起，正在引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 and 世界文化的融合，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是预言，更是行动！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公民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商人 /1

第 一 章 浙商 /1

「所有动物中，旅鼠繁殖力最强。它们机巧灵活，进退如电。这与浙商特点极为类似。有人说，浙商如今已是天下第一商帮；但也有人认为，他们其实是天下第一鼠帮。」

第 二 章 晋商 /23

「黄牛是中国固有的牛种。山西商人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他们是吃苦耐劳的老黄牛。但是，一旦丧失信用，他们也很容易变成“黄牛党”。」

第 三 章 闽商 /45

「福建商人是蛇还是龙？这关键要看海边那扇门。爱拼搏、爱冒险的闽商，一旦跨出省门，便如游龙入大海。」

第 四 章 徽商 /67

「“徽骆驼”是安徽人最响亮的外号。他们很能吃苦，但现在的问题是：在沙漠变绿洲的世纪，徽商怎么轻装前行？」

第 五 章 粤商 /91

「鼠狐猴是地球上最机灵的动物。粤商亦是中国商帮中最机敏的，他们集鼠、狐、猴三者特性于一身，算得上是财力社会的中国商人的典范。」

第④章

赣商 /113

「家犬，狼的近亲，但缺乏狼的团体精神。赣商亦如此，有点恋家，小富即安。少几分温顺，多几分个性，方可驰骋天下。」

第⑤章

苏商 /129

「孔雀是“万鸟之王”，可它的双翼其实并不太发达，飞行速度慢，而且十分笨拙。高贵有余、行动不足的苏商，何时能够真正地腾飞万里？」

第⑥章

陕商 /143

「狮子虽是“万兽之王”，但是今天，亚洲狮几乎灭绝。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陕商，是继续躺在“光阴的故事”里沉睡，还是激情地吼上一曲“梦回唐朝”？」

第⑦章

鲁商 /159

「大象是充分社会化的群居动物，以家族为单位，讲规矩，听指挥，它们嗅觉、听觉灵敏，但是视觉较差，看不到长远——这也是鲁商天性里的缺陷。」

第⑧章

湘商 /179

「湖南人既霸蛮、果敢，又浮躁、飘忽；既有驴的坚韧，又有马的奔放；非驴非马，南商北相，俨然“杂商”。如今的湘商该如何寻回湘魂，经营天下？」

后记 /202



所有动物中，老鼠繁殖力最强。它们机巧灵活，进退如电。这与浙商特点极为类似。有人说，浙商如今已是天下第一商帮；但有人说，他们其实是天下第一鼠帮。

浙商

第壹章

奇特的崛起

老几代的中国人不少穿过中山装，然而，如有人问：中山装是怎么来的？恐怕还真没多少人知道。

这还得从“红帮裁缝”说起。

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眨眼间，涌进来不少蓝眼睛、红头发的洋人。宁波裁缝专门给这些外国人做西装，却又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人，用钱钟书的话说，但看他们不知是人是鬼还是兽，于是胡乱叫做“红毛人”，可他们自己也因此被别人叫成了“红帮裁缝”。

早在十八世纪末，宁波人就会摆弄“三刀”（剪刀、菜刀、剃头刀）出名，他们将这些小玩意玩出了大名堂，甚至还一口气带到了日本横滨。1921年出版的《上海总商会月刊》，就记载了“红帮裁缝”创始人张尚义的传奇故事：

清嘉庆年间，张尚义学了裁缝手艺却没法糊口，被迫改行在渔船上帮厨烧火。船正开着呢，横渡杭州湾时突遇海难，船一下被打翻，小裁缝张尚义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漂到了日本横滨，被当地水兵救起。

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张尚义凭借裁缝手艺，寄居码头靠修补救生衣度日。他看到港区内有不少俄国渔民和荷兰客商都穿西装，于是灵机一动，趁补衣之机，将洋人的西装拆开，做成样板，学习裁制。正所谓熟能生巧，偷学几次后，他成了制作西服的高手。后来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日后会成为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孙中山居然也注意到了他们。

1905年，孙中山在横滨组织同盟会，宁波裁缝根据他的意愿，以日本士官服为原型，设计了早期的中山装。

六年之后，辛亥革命突然成功，孙中山抓紧创建民国。值此社会巨变，人

们面临观念大变，首当其冲的便是改变外形——清朝的辫子被剪掉了，竹筒长衫和西装成为民国初年的时尚。不过，长衫外面罩西装的滑稽穿着，仍在大街上屡见不鲜。

孙中山提出要改进中山装。作为临时大总统，他做梦都想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尚义的事业传人王才运，王才运立即召集“红帮裁缝”的技师巧匠，采纳西装特点，垫肩、衬夹、夹里，并吸收日本陆军士官服外形，改十粒纽扣为七粒纽扣，样衣尺寸也是按孙中山的身材裁剪。

孙中山穿上之后拍案叫好，但他琢磨了一下，觉得还得加点象征含义，于是他亲手在样衣图纸上修改：七粒纽扣改成五粒纽扣，象征“五权宪法”；胸前两贴袋的袋盖改为倒山形的笔架式，象征革命需要笔杆子。他把这种服装定名为“中山装”。后来，孙中山穿着这套衣服在上海南京路走了一趟，全上海顿时轰动，厂家纷纷仿制，从此风行起来。

孙中山亲自出面做了这么大一个免费活广告，“红帮裁缝”嗅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借势而上，将分店开得星罗棋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

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也要“红帮裁缝”设计服装。今天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身着的“人民装”，就出自“红帮裁缝”之手。

“红帮裁缝”成了中国服装第一品牌。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一种说法，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宁波生产出来的。

从这些兜兜转转的故事里，我们约略看见以“红帮裁缝”为代表的宁波商帮的一个侧影。宁波商人正是从类似这些他人看不见的、不起眼的事情着手，越做越大。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商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此外，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包玉刚这样的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令人称奇的是，除了宁波商帮，浙江还有一个龙游商帮，也被列入了中国

传统十大商帮，此外，浙江还先后产生过：湖州商帮、温州商帮、义乌商帮。

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生出惊叹：一块面积不过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商帮如林，而且继晋商、徽商之后，能够全面勃兴，遍地开花，尤其在今天后来居上，业绩斐然，令人瞩目。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逐利的天性

百丈之木，必有其根。要了解浙商全面勃兴的原因，先要了解浙江。

据史，浙江本来是钱塘江的古称。“浙”含义也就一个：曲折的江水。所以在叫“浙江”之前，有段时间是直接叫“折江”的，也有人喊偏了音，叫成了“之江”。折也好，之也好，都是看图说话的象形含义，而这些恰恰都是浙江的本名。

浙江西边的邻居是安徽，这是个有文化的好伙伴。浙江名字来源于钱塘江，钱塘江源头正在安徽黄山。这样看来，浙商与徽商，在文化上似乎还有点同宗同源的味道。

浙江往北，是江苏、上海。江苏跟浙江是一个味道，不存在谁影响谁。而上海本是个小县城，正宗的上海人基本没有几个，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移民过去的，其中又以浙江人最多。可以说，在文化上，是浙江影响上海，而不是上海影响浙江。

浙江往南是福建，与浙江同处沿海，两者都是一个特性，但是浙商没有那么鲜明显著的海盗性格，因为浙江没有福建那么偏。闽、浙气质接近，各行其是，谁也没影响谁。

此外，虽然隔着茫茫东海，日本与浙江其实颇有渊源，它给浙江地域文化带来的影响，无论融合还是冲突，正或者反，都会非同小可。

有一本叫《日本人的“色道”》的书，说了这样一件奇事：宋朝时，江浙地区尤其是明州（今宁波）等地有大批商人到日本做贸易，为了等待信风，

往往要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于是日本妓女们纷纷来这里讨生活。当时的日本流行“走访婚”，晚上任何男人进入某个村庄，女人都会开门延纳，一些日本女人便主动找中国男人“度种”。

为什么日本女人找浙江人“度种”？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出的是，江浙一带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历来频繁，而日本改革后的工商业发展，对江浙人的生产与需求，都产生过连带性的影响。

了解了浙江的这些邻居，我们才好对浙商进行分类。中国的商帮，依据地域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农商”，像晋商、徽商、湘商都是，它们从传统小农经济起步，与封建帝国制度相适应，与农业文明一并同起同落，同荣同衰；另一类就是“海商”，像闽商、浙商就是。白浪滔天的海洋，带给他们游牧民族一样的不安全感，而对外贸易带给他们的市场契约与理性的观念，促使他们发育出不成熟的财力社会模式中的工商业文明。

浙江的工商业文明发育得并不健康的根本原因在于，浙江的文化传统与工商价值观的冲突，异常剧烈。

浙江是受传统文化熏陶非常深厚的地方。以个例为证，王安石当年在这里开创了一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是封建帝国制度的精髓。

我们从浙江产生过的文化名人就不难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哲学家、思想家有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政治家有勾践、孙权、周恩来、蒋介石；诗人有贺知章、骆宾王、孟郊、周邦彦、陆游；科学家有沈括；戏剧家有李渔、洪升、高则诚；教育家有蔡元培，学问家有章太炎、王国维等。

有人统计，从东汉到现代，浙江籍文学家载入史册者超过一千人，占去全国的六分之一，这数字确实很吓人。现代以来，随便一数，就有鲁迅、茅盾、徐志摩、柔石、殷夫、郁达夫、冯雪峰、夏衍、艾青、金庸、余秋雨。

正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在浙江树大根深，所以，浙商的道路，在实质上难免步了徽商的后尘：亦儒亦商，亦商亦儒。因此，从浙江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但他们又有分别：徽商做大后多傍大官去了，胡雪